

第 一 章 引 论

一、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由于本书篇幅上的原因和专题研究的要求，作者把本书研究的对象，作了时间、地域、内涵上的限定。时间为 1840—1919 年，与以往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限相一致。地域是岭南地区，具体的说就是广东省、广西省（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部分、香港、澳门。内涵是岭南地区与世界各地（主要为东南亚、欧洲、美洲、日本）的文化往来交流的历史。

有关文化的含义，学术界有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与深义的文化之说（见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1979 年版《辞海》“文化”条对其含义是这样界定的：“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

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既然文化有那么多不同的概念，那么对于文化交流的研究范围，也应有所界定为好。我们认为，从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交流的角度来说，取广义的文化更切合实际一些。因为世界各地的互通有无，先是从物质文化入手，再进一步涉及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但从本书研究的目的来说，我们又更多地把精神文化作为重点对象。由于这样的原因，本书对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广义的文化作为范围，而以狭义的文化作为重点。至于深义的文化，则是在广义和狭义文化基础上概括、提炼、抽象升华出来的民族本质、民族精神、民族特征，它是溶于广义和狭义文化之中，又高于它们的一种抽象的东西，所以在本书的叙述中，虽然没有专门加以论述，但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在具体的编排中，本书把文化现象加以粗略的分类，再按类阐释。这种分类不是全面的，不可能包括文化的一切类别，只能根据岭南的实际有重点地选择适当的类别。本书选取的类别有：有关观念形态的宗教、哲学、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科学、艺术等等；有关制度文化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等；有关行为文化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食、礼仪等等；有关文化组织机构的新闻出版部门、学校、医院等等。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便于叙述。

总的来说，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岭南近代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的产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及其规律性。

岭南自古便与海外进行文化交流，但是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岭南并与岭南文化进行初步融合，是从近代才开始的，

所以，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不光是地域交流上达到一个新阶段，而且在交流程度上也达到一个新阶段。古代与近代的文化交流，其不同点首先是交流的范围从东南亚、非洲东岸扩大到了欧洲、美洲，其次是交流的内容从封建时代文化转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再次，交流的结果从同化别人到被人局部同化。这些令人瞩目的特点使得研究这一阶段的历史对岭南以至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本书力图通过史实的研究，对以下问题提供一些意见：

1. 西方文化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以什么方式进入岭南的，其遭遇和经历如何，昭示了哪些经验教训；

2. 岭南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何，前后有什么变化，他们是如何吸取西方文化的，有什么成功和失败的记录；

3. 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作出何种反应，处于何种地位，自身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学与西学的结合点在哪里；

4. 岭南人如何寻找中西会通融合的方式和道路，他们的探索对中国走向近代化有什么意义；

5. 近代岭南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如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

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也是 19 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封闭是不智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主动地走向世界，吸取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才能加快自己前进的脚步。但这个过程也是艰难的，充满矛盾和斗

争的。走出谬误，驱散迷雾，积极探索，是每一代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让中国固有的文化宝库，既保持和发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和个性，又吸收更多的外来新营养而推陈出新，更加充实和发展，并以自己的文化精萃为世界文化宝库增加光彩。这是文化交流的意义，也是本书的研究目的。

二、交流的过程和阶段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 世纪中期，时间约为 1840—1870 年，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开端时期，中西文化开始了初步的接触。

这一阶段中，由于中国自清代中期开始执行的严厉的闭关自守政策，对外文化交流处于停滞的、倒退的、与世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虽因鸦片战争而被强力所打破，但外来文化基本上是采取强制的方式输入，中国文化在外力冲击下面临严重挑战。又由于外来文化主要通过传教士之手输入，而且主要内容是宗教，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伦常道德背道而驰，所以，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异常强烈的拒斥效应。传教士主要通过与下层人民的接触宣传西方文化，也使这种文化交流受到很大的限制。更兼岭南处于西方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前沿，促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岭南首先兴起，这种民族主义在产生时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因此在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冲突比较频繁，除了个别人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正确认识和作出了突出贡献以外，整个社会的中外文

化交流是不多的。

西方传教士对此首先有深刻的体会，他们在传教的同时，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并首先对岭南输入西方医学以博取人们的好感。但总的来讲，发展信徒的成果非常可怜。美以美会在华传教 10 年，才在 1857 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传教 9 年，才在 1856 年吸收到 1 名信徒。伯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院，求医者甚多，但没有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直到 1847 年才有一个中国人信了教。而郭实腊组织的“福汉会”，虽然号称发展了 2000 多名会员，但大多数是“吃教”的下层民众，甚至有不少流氓无赖，没有一定的信仰，不久便星散。只有社会的反叛者洪秀全和洪仁玕接受了西方宗教并利用它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但随着起义的失败，西方宗教的传播并无多大起色。

但这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部分岭南人已经开始了对外方文化的了解和介绍，而且目的相当明确，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此时期岭南人以主动姿态吸取的西方文化，主要是世界历史地理学和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通过岭南的开放扩大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他们在岭南的办报活动空前活跃，出版业也迅速发展，大量的中国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西方国家，西方“中国学”开始了它的起步阶段。

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后期，时间约为 1861—1895 年，是中外文化扩大接触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需要利用西

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于是学习西方的语言、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被首先提出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甚至由国家选派中国学生出洋留学，培养熟悉西方文化的人才。中国开始了主动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的阶段，虽然所学的只是比较表面的东西，但毕竟从被动转入了主动。而西方国家为了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也积极地加以配合，西方专家开始进入某些政府机构任职，传教士活跃地在各地开办教会学校。

在岭南，由于香港、澳门的割让和租借，由外国人进行建设和管理，成了西方文化进入岭南的基地，因而岭南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走得更快，西方的经济思想、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等等，已经传入岭南。并在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岭南学子也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更多更早地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传教士们也开始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中国知识阶层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和自尊，从而逐渐改变了以西方文化完全代替中国文化的幻想，他们有的致力于翻译中国的经典，更深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了中国文化的积极宣传者；有的提出了急功近利式的文化融合方式，即“孔子加耶稣”的文化融合方式。从以前的“要么是孔子，要么是耶稣，二者只能择一，没有融合的余地”的指导思想变为“中国自有学，且自有至善之学，断不敢劝其舍中而从西也”（林乐知语），“耶稣心合孔孟者也，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耶教亦重五伦”。他们希望以此使西方文化找到一条

渗入到中国思想文化的代表人物中的道路。即不但让普通人民，而且让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应该说，“孔子加耶稣”亦是企图融会中西文化的一个创造。其出发点至少是尊重中国文化的，在所谓“西方文化优越论”之外另树一帜。

第三阶段是 19、20 世纪之交，时间约为 1890—1910 年，是岭南对外文化深入交流的时期。

在上一阶段岭南对外文化的交流中，交流的内容几乎扩展至文化领域的一切主要方面，但也存在一个突出的不足，就是往往失之过浅。在“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笼罩下，对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还涉足较少或者浅尝辄止。这一不足在第三阶段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克服。

从 90 年代开始岭南对外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逐渐深入，主要是由于维新运动的推动。维新运动虽然一般以 1895 年发生于北京的“公车上书”为正式开端，它的真正发源地却是在远离京师的岭南。维新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不断产生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紧迫和更高水平的需求，这就使得充当维新派主要领袖的岭南思想家们一次又一次迈出新的一步。

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是岭南维新思想家突破“中体西用”观念的束缚，跳出各门具体知识的狭小领域，第一次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融会贯通，形成了以“人类公理”和《大同书》为代表的新的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含了新的哲学、新的伦理学、新的社会理想等极为丰富、颇有创意的文化内容。

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岭南维新思想家直接从维新运动的现实需要出发，在此前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外国富强经验作了全面、系统，并以实际运用为目的的总结。他们的总结有一个重要的发展之处，就是将中国人历来主张的直接学习西方，改变成为通过仿效日本而间接学习西方。这当中实际上已包含着一个颇为深刻的思想：学习西方（进行中外文化交流）必须尽可能地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因为日本与中国在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有较多相同之处）。而他们对日本富强经验主要是“变政”经验的研究，也可以说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三是岭南维新思想家还极为重视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研究，用以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这一工作在戊戌维新时期已经开始，但富有成效的展开却是在逃亡日本之后，主要从事者是梁启超。他在短短的几年间，写了数十篇直接间接宣传介绍西方社会学说的文字，从霍布斯到卢梭，从达尔文到颉德，从笛卡尔到康德，许多自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享有盛名的思想家，都成为他介绍和品评的对象。这项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工作无疑使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是 20 世纪初年至五四运动，时间约为 1905—1919 年，是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继续探索时期。

所谓继续探索，是指岭南对外文化交流与过去相比，在方向上发生了一些转折性的变化。在这一阶段不长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时局的变动异常迅速而剧烈。先是维新运动的

失败，接着是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然后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最后是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和反对北洋军阀斗争的此起彼伏。变化的时局不能不对岭南对外文化交流产生重大影响，要求不同派别的思想家们作出新的选择。对岭南维新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由于走出国门而对外国文化有了更多更直接的了解，站在维新的立场上，他们对中外文化交流仍能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作出新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由于反对革命和民主共和制而在中国文化交流上更多地是持保守的心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表了不少错误的明显倒退的观点。对岭南革命派思想家而言，他们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站到了前沿，他们提出的新见解和获得的新成果超过了原来领先的岭南维新派，并使对外文化交流朝着新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此外，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继续探索还表现在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上，就是这一时期人们除了继续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保持着热情之外，还开始重视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介绍，出现了廖仲恺、朱执信、刘思复等一批重要代表人物。这是学习西方的思潮开始转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进步思潮中的主流地位行将被取代的明显征兆。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大致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在时间上略有交叉。可以说整个过程是起伏曲折的，交流是逐步深入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中国文化从岭南的输出是同时进行的，是一个双向的流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落后于西方，以及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个双向的运动又不是对等的，即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多，而中国文化输出外国相对的少。而西方文化的输入，经历了一个西方强迫输入、中国被迫接受和不时抗拒到中国主动学习引进的过程；西方文化的输入者，也经历了以传教士为主体到以中国具有先进思想、代表先进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过程。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中国没有受到西方完全的同化，但也不能排斥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于是，便产生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它是中国近代文化的新生形态，尽管这个新生形态是不成熟、不系统、不定型的一种过渡形态，但它为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宽广的道路。

三、交流的内容和特点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与中国内地相比、与岭南古代相比，都有不同的地方。现把其特点归纳如下：

特点之一：近代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与文化东传同时进行，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岭南由于处在对外战争的前沿，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西方用侵略的强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着的大门，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开出了一条通道。但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大炮、鸦片和不平等条约而来，违反了中国人的意愿，亦给西方文化

在中国的传播造成困难。非和平的、非平等的交往，使中西文化交流蒙上了不太愉快的阴影。早期，摩擦和冲突不断，出现了侵略和反侵略、输入和反输入、吸收和反吸收的斗争。这使岭南对外文化交流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停滞和倒退。有一段时期（1840—1860 年）甚至因反侵略斗争的高涨而出现普遍拒绝接受西方文化的社会心理，一度使岭南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落在上海等江南地区的后头。

如何看待侵略者与其文化的关系，是近代岭南人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西方文化的输入是在中外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强制进行的。因此，它首先是一种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但同时，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它又是一种文化交流的特殊方式。明智的民族，应该尽快地从巨大的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既敢于与侵略者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向自己的敌人学习，或者化敌为友，都不失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出路。因为，首先，文化与政治毕竟不是一回事，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不应该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第二，不管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是谁和怀有什么目的，在中国处于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吸取外来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破坏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介绍，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走向世界。所以后来，岭南人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优越，变被动被迫为主动积极的引进西方文化，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西方文化热，不少有识之士还结合中国实际需要，摒弃了某些西方人士输入的西方文化中保守和消极的方

面，吸取西方文明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平等学说等，从而使中西文化交流逐步走向正轨。

特点之二：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在中国和外国的学者合作之下得以迅速推进的。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在中国近代与外国刚刚接触的时候，要求一个外国人熟知中国文化和要求一个中国人熟知外国文化都是不实际的。所以，外国文化人谋求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成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这一做法是以岭南人首开其端。

1851 年，英国医生合信在广州撰写西医专著《全体新论》，就请了中国医生、南海人陈修堂相助。由合信收集西方国家的医学著作，做成人体模型，与陈修堂商榷研究，然后按中国人阅读和理解的习惯，由陈删繁撮要，译述成书。

1863 年，香港英华书院院长、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的过程中，深感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根底浅薄，便邀请了刚到香港的王韬襄助他完成（中国经典）这一宏大的翻译工程。终于在 1885 年成功地译出了十三经，为中国文化的西传作出了贡献。

岭南学者开创的这种国际性文化合作，对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后来，这种文化合作被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进一步发扬，1867 年，该馆附设译书馆，由英国人傅兰雅和中国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

特点之三：“文化共存”思想是岭南对外文化交流顺利开展的心理因素。

“文化共存”的思想，是岭南文化包容性的表现。岭南文化的形成，是融合了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的结果。因此，岭南人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一般能持比较开通和宽容的态度，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的养分以丰富和发展自己。

在香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存共生，有口皆碑。罗香林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一书中，对香港华人善于保存国粹的“自我存在”与善于学习别人的“共同存在”二重性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港诸华人，唯其基于有传统之‘共同存在’性格，故能同为浸润于西洋文化，而更为创进，以传播于中国，使其能为应有发展；唯其基于有传统之‘自我存在’性格，故能于此确保中国之优良文化，传授中国学术，激扬风烈，而无所于馁。”他认为岭南人的独立性与包容性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正常发展。

岭南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早打破“体用观”和“器道观”，主张中西文化全面交流和融合。早在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之前，洪仁玕已经提出不分体用地全面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宗教思想、民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等。郑观应最早认清了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王韬认为中西之道只有差异，没有优劣之分，“器”是沟通中西之“道”的契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更不用说，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比前人更为客观公正，心态也更为健康、积极。

当然，作为一个对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区域来说，其内部也是存在差别的。广东省内和香港、澳门的文化氛围便有较大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广东省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而港澳却在外国人统治之下的缘故吧。清政府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离心倾向是特别敏感的，控制也特别的严厉，历届粤督都比较保守，除张之洞和岑春煊稍有建树外，洋务运动在他们手中开展得很慢。广东大儒们的中华文化优越感和排外心态也不见得比北方士大夫们轻，某些文化精英如梁廷枏、陈澧、朱次琦等局限于儒家文化的道统之中，没能开创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新局面和写出领导潮流的振聋发聩之作。而积极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物，囿于这种文化控制和封闭的气氛，不能在广东省内有所作为。他们的事业发端于岭南，却往往结果于外地。如洪秀全要到广西传教，康有为要到上海买书，孙中山要到檀香山和香港求学，这与广东省内较为封闭的文化氛围都有直接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岭南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外来文化持颇为宽容的态度，对西方文化较早地在岭南地区被吸纳，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

特点之四：“西学东渐”在近代岭南对外文化交流中占着很大的比重。

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其重心是中西文化交流，而中西文化交流，又以西学东渐为主，中学西传为次。这是时代的特点，是整个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而西方起步较早的形势造成的。除了西方列强对东方的殖民扩张和民族同化政策在其中起作用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这就是文化发展

的差距。当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新航路开通之时，中国文化还处于先进的地位，17、18 世纪时中国文化曾系统传入欧洲并在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子甚至成了欧洲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大师。但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而中国却从封建盛世向下坡路滑落，中、西文化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命运大变，西方人不但不再崇拜中国文化，甚至产生了藐视的心理。中学西传自 18 世纪末期以后，便一直衰落下来。19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国际战争中屡战屡败，不但使西方人轻视中国，甚至使得中国人也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怀疑，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到后来从被动、抗拒西方文化到主动、积极学习吸收，寻求救国良方，这样“西学东渐”便自然发生，并成为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

四、交流的意义和影响

岭南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 延续到五四运动之前，一共进行了 80 年。这 80 年与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说岭南的对外文化交流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从区域文化的眼光来看，岭南对外文化交流在全国来说则尤为活跃和突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国近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缩影，其意义和影响都是重大的。

首先，岭南对外文化交流成为中国近代新的思想文化产

生和发展的源泉。

如果用古代文明的尺度来衡量，中国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发达、十分完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毫不逊色的文化系统的发源地。这一文化系统不仅使中国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而且对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日本等）乃至欧洲国家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随着近代的来临，中国文化的自我生长和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经过长期和高度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种僵死而衰朽的机制，从内部严重窒息着文化进步的生机；另一方面，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在欧美经过如日中天的发展之后，又以强劲的势头对中国进行冲击，它的无可辩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造成了几代人对西方文化的羡慕、渴求及尽力吸纳的心理。中外文化交流于是成为中国文化重新发展、重新振兴的必由之路。

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意义正是在于，在岭南这个近代中外文化接触得最早、最多的独特区域，岭南人（包括寓居岭南的人士）进行了外国文化的介绍引进和中外文化结合最初的、持续的实践，经过艰辛而卓越的努力，终于打破了中国文化停滞落后的僵局，使新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涌现成为不可改易的现实。这在岭南近代一大批著名的思想文化人物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仁玕根据在香港居住所获得的西学知识，著成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一方面在思想上宣告了历来作为农民革命指导思想的传统平均主义的终结，一方面成为中国即将兴起的近

代化思潮的先声。在洋务运动时期，王韬、郑观应、何启等突破洋务派师夷之末的局限，深入探究西人立国之本，大力鼓吹议院制，并融合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宣扬“君民共主”的新观点，使之成为此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改革主张的生长点。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从中西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世界观，并进而用西学革新孔子学说，形成一整套变法的理论和主张，对中国出现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起了重大作用。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融合中西文化，创立了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和理论体系的三民主义，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几个重要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除外）新思想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大都出在岭南，这与岭南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岭南人具有历史留传下来的善于吸纳、创造的文化特征是分不开的。

其次，岭南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对全国形成了广泛而强烈的辐射。

近代岭南与古代岭南在文化特征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它不再是一个被作为南蛮之地、流放之地而只能承受中原正统文化的流风余韵的文化边缘区，而是成了一个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交流往往首先在此起步的文化中转地。与此相一致，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于岭南产生后也不会在此地长驻，而是迅即向全国辐射，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岭南对外文化交流成果在每个历史时期辐射的方式、程度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洪秀全用儒学和农民平均主义改造